



她就是答案

日本东京，一位职业女性到资生堂托儿所接她的女儿。

木下裕子、卡尔帕纳·科赫哈

女性能有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人口萎缩问题

全球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深远。当劳动适龄人口减少时，在多数情况下劳动力人口也在萎缩，经济增长的潜力也相应缩小。大部分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正在减少，而养老金和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却不断增加，这给政府收入施加了压力。

女性在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球人口中超过一半是女性。由于女性的寿命普遍比男性长，因此65岁以上人口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更高。然而，过去20年间真正参与到劳动力大军中的劳动适龄女性的比例（即女性劳动参与率）却一直在50%左右徘徊。但这一全球平均水平掩盖了各地区在其水平和趋势方面的巨大差异。这一比率从中东和北非的21%到东亚、撒哈拉以南非洲、美国和北欧的60%以上，各不相同。尽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此期间经历了强劲的增长（增加了13个百分点），但南亚的比率却在下跌。虽然女性参与率停滞不前，然而男女参与

率之间的差距（男性劳动参与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之差）自1990年以来却在不断缩小，但这并非是由于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了，而是因为男性劳动参与率下降了。

差距仍然存在

男女在教育方面的性别差距尽管正在缩小，然而在诸如获得医疗卫生、金融服务、工资和法定权利等其他很多机遇方面，性别差距仍然存在。即使是在最不发达的经济体，女性和男性的初级教育入学率之比达到了94%。在中等教育入学率方面，男女之比平均为97%，而如今女性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即进入大学或者学院）高于男性。这些都是可喜的积极发展。然而，这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大部分都未参与到劳动力大军当中，真是个巨大的损失。

当女性能发挥其所有的劳动力市场潜力时，便有可能获得巨大的宏观经济增长红利。例如，阿吉雷等人（Aguirre等

亚洲的情况

在亚洲，女性的角色根据其所在国家所处的人口年龄阶段不同而不同。南亚国家处于人口转变的早期，诸如孟加拉国和印度，其死亡率急剧下降，同时出生率保持在高位。东亚国家（即东盟国家）处于人口转变的中期，其出生率开始下降，人口增长开始出现停滞。而诸如日本和韩国这样的亚洲发达国家则处于人口转变的末期，其出生率已经跌至替代水平之下，人口已经或者即将出现萎缩。

东亚地区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期间经历了相对较快的人口转变，这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奇迹”起到了重要作用。公共医疗卫生的改善使婴儿死亡率下降，并带来了“婴儿潮”，随后生育率出现下跌。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当二战后“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适龄阶段时，这些人加入劳动力大军导致工作者与家属之比随之上升。这一转变使女性普遍从中受益：更好的医疗卫生和更少的时间照看孩子将她们解放出来，外出工作和接受教育。这一良性循环不仅让女性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作用，同时也使其从经济增长中受益。

在处于人口转变早期南亚国家（如孟加拉国和印度），女性的作用至关重要。为了充分受益于潜在的人口红利，南亚国家应该将重点放在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增强女性的技能方面，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交通和电力，以支持所有工作者，并提升劳动力市场的弹性（Das 等人，2015）。这些国家必须消除管理、制度以及社会壁垒，以最大限度地让其人才发挥作用并获得

最大的红利。

在亚洲发达经济体（如日本和韩国），最重要的是提升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这些国家，女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和抵消老龄化、甚至人口萎缩的关键所在。例如，日本的人口预期寿命目前是 84 岁，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但其生育率却一直在低位徘徊。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步入退休年龄，供养比率（old-age dependency ratio）攀升至全球最高水平。

随着劳动适龄人口的萎缩，日本的 GDP 很可能会落后于其邻国，除非其每个工作者的产出增长高于其劳动力缩减的速度。IMF 估计，如果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 G7 国家的平均水平，其年经济增长将提高 1/4 个百分点，这将使其人均 GDP 与基准情形相比固定增长 4%。更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还意味着更多的熟练工作者，因为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见“妇女能否拯救日本（以及亚洲）？”，《金融与发展》2012 年 10 月号）。

对于日本来说，更好地发挥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的作用是最简便的途径，首相安倍晋三深谙此道——为复兴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战略的重要基础便是让更多的女性参加工作。自 2013 年安倍经济学推出以来，由于延长产假福利和其他政策的推出，使得处于生育年龄的职业女性的数量大幅上升。虽然更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对于处在人口转变不同阶段的国家而言都非常重要，但对于那些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国家来说，女性劳动力供给则必不可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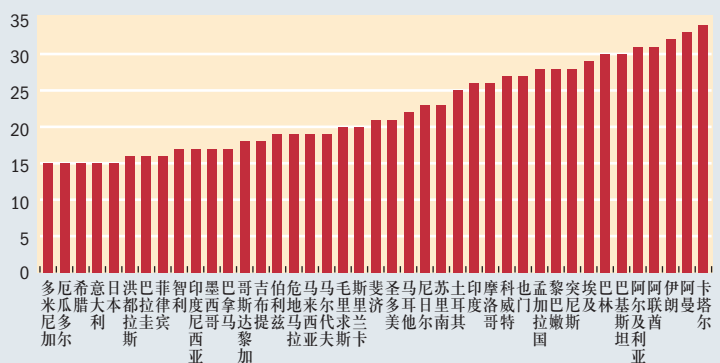
人，2012）提出，各国将其女性劳动参与率水平提高至男性的水平能够使美国的 GDP 增长 5%，日本增长 9%，阿联酋增长 12%，埃及增长 34%。库柏瑞斯和泰格尼尔（Cuberes 和 Teignier，即将发布）估计，由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性别差异导致的人均 GDP 损失在部分地区平均高达 27%（见图 1）。

如何为女性提供机遇，使其参与到劳动力大军当中，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快的经济增长？当女性能受到公平对待时，经济发展总体将会受益。学校的入学率也将上升，因为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将其收入花在教育上。投入方面的平等将使女性经营的公司的生产力得到提升，雇佣员工方面的平等将使公司能够获得更多的人才，对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影响。在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能缓解劳动力萎缩产生的影响，促进经济增长。

为提高女性的劳动力参与度，政府和私营部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推行政策来缩小在医疗卫生、

图1
损失

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距导致很多国家的GDP损失严重。
(由性别差距造成的损失,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库柏瑞斯和泰格尼尔的估计（Cuberes和Teignier，2015）。
注：圣多美指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教育、基础设施服务以及获得金融服务方面的性别差距，鼓励支持施行产假及改善幼儿看护设施方面的规定。以个人为单位，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征收所得税，能促使家

里有第二个人外出工作，通常是女性。在那些基于性别制定法规的国家，如女性不能拥有房地产或经营公司，消除这些限制能有助于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Gonzales 等人，2015）。私营部门可以通过增强合同和工作环境的灵活度，以及采取绩效奖励，而非看重资历或工作时长评估方法，来发挥作用。

除了增加女性工作者的数量以外，改善工作质量能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在非正规和非正式部门从业的大部分是女性。在很多国家，与常规和全职工作相比，这类工作岗位所提供的福利更低，保障更少。然而，例如在北欧国家和荷兰，非常规工作者（包括兼职工作者）通常能得到部分福利和津贴。这些福利能促使女性劳动生产率提升，提高女性的生产力，并在中期缩小工资方面的性别差距（Kinoshita 和 Guo，2015）。

工作和生育

人们普遍担心，更多的女性外出工作将导致生育率下降，加剧人口数量的萎缩。的确，就单个国家而言，有证据显示随着外出工作的女性数量的增加，出生率下降。例如，布鲁姆等人（Bloom 等人，2009）发现，女性在其生育年龄段，每生一个孩子将使其平均减少两年的劳动供给。

虽然在个别国家这两个变量为负相关关系，但综合各国的情况而言，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研究人员通过探究男性对家庭所做的贡献来对这一明显的矛盾现象进行解释（De Laat 和 Sevilla-Sanz，2011）。他们发现，在那些男性能分担更多家务劳动和照看孩子的国家，女性更有可能兼顾生养孩子和工作，这使得这些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更高，同时还能保持相对高的生育水平。

在那些男性能分担更多家务劳动和照看孩子的国家，女性更有可能兼顾生养孩子和工作。

此外，自1985年以来，经合组织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间的关系似乎从负相关转变为正相关（Brewster 和 Rindfuss，2000）。这一转变表明，当女性外出工作，为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时，他们也能负担得起养育更多的孩子。这一趋势还反映出社会对于职业妇女以及父亲照看孩子的态度的转变，以及科技的进步发展使工作场所变得更加灵活。诸如更加慷慨的产假和更加有效的儿童看护方面的公共政策也发挥了作用（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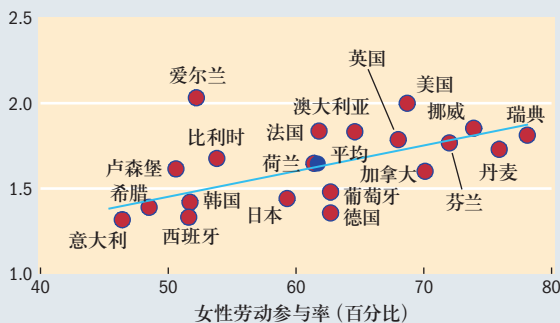
在人口转变过程的早期，外出工作的女性可能会选择

图2

更多工作，更多孩子

得益于更多的家庭收入、社会规范转变以及支持职业女性的政策，那些女性劳动参与率高的国家的生育率也较高。

（生育率，每位女性生育的孩子总数，1985—2012年）



资料来源：Kinoshita和Guo (2015)。

生育更少的孩子。随着人口数量的萎缩，在中期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已不再适合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的政策措施和全社会必须帮助支持那些确保女性能平衡其工作和家庭的环境和条件。■

木下裕子（Yuko Kinoshita）是IMF亚太部的副处长，卡尔帕纳·科赫哈（Kalpana Kochhar）是该部的副主任。

参考文献：

- Aguirre, DeAnne, Leila Hoteit, Christine Rupp, and Karim Sabbagh, 2012, "Empowering the Third Billion: Women and the World of Work in 2012," Strategy & (formerly Booz and Company) report (Arlington, Virginia).
- Bloom, David E., David Canning, Gunther Fink, and Jocelyn E. Finlay, 2009, "Fertility,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4, No. 2, pp. 79-101.
- Brewster, Karin L., and Ronald R. Rindfuss, 2000, "Fertility and Women's Employment i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6, pp. 271-96.
- Cluberes, David, and Marc Teignier, forthcoming, "Aggregate Costs of Gender Gaps in the Labor Market: A Quantitative Estimate," *Journal of Human Capital*.
- Das, Sonali, Sonali Jain-Chandra, Kalpana Kochhar, and Naresh Kumar, 2015, "Women Workers in India: Why So Few among So Many?" *IMF Working Paper 15/55*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De Laat, Joost, and Almudena Sevilla-Sanz, 2011, "The Fertility and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Puzzle in OECD Countries: The Role of Men's Home Production," *Feminist Economics*, Vol. 17, No. 2, pp. 87-119.
- Gonzales, Christian, Sonali Jain-Chandra, Kalpana Kochhar, and Monique Newiak, 2015, "Fair Play: More Equal Laws Boost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5/02*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Kinoshita, Yuko, and Fang Guo, 2015, "What Can Boost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Asia?" *IMF Working Paper 15/56*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